

《中国艺术地理丛书》编委会

主任：王宏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副主任：易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委员：杨辛（北京大学教授）

葛路（北京大学教授）

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伟（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

杨文军（山东美术出版社主任、副编审）

主编：黄丹麓（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

副主编：刘晓陶（鲁迅美术学院硕士、工笔花鸟画家）



李乃蔚 / 江南好采莲



《中国艺术地理丛书》

总序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整体延续性发生了断裂，西学开始逐步压倒中学，中国从主权、政治到文化、艺术都陷入了半殖民地之境地。中西体用之争、国粹与洋学之辩自此日盛于日。“全盘西化”、“全球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

等命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路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美术界也掀起了关于国际化的大讨论（当时笔者是坚决支持“美术国际化”这一命题的，并在《美术报》、《画廊》等刊物上与反对“美术国际化”的钱海源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现在看来，“美术的国际化”既是一个美术策略与文化策略，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当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与再造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从美术的视角来看，中西方在近代都走入了一个困境。中国的写意水墨画发展到明清，已经山穷水尽、“江郎才尽”，所以有识之士便把目光投向西方，试图以西方的写实主义为中国的传统美术注入一剂良药，借助外力摆脱艺术的困境；西方写实主义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印象派以前，达到了顶峰，同样再难有发

展的余地，摄影术的发明加快了写实主义的崩溃，因而西方的智者——印象派画家们把目光转向东方，他们从中国的近邻——日本的“浮世绘”中得到灵感与启发，创造了西方的“写意艺术”与表现主义。外来的文化与外来的艺术只能作为一种资源与营养，决不能生吞活剥，任何艺术创造都必然善于从其他民族的精粹中提取养料，并迅速加以“内化”，进而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所以说，中国的写实艺术不同于西方的写实主义，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不同于黑人木雕。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中说：“一些时间以前，我曾经极其粗略地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人通过他的语言居于存在的宣告和召唤中，那么我们欧洲人和东方人也许居于完全不同的家中。

……因此，两家的对话仍然近于不可能。”潘天寿认为：“中西绘画要拉大距离。”二者的意图都在于强调文化与艺术的民族个性，反对盲目的融合与互换。

《中国艺术地理丛书》的理想与目标就在于反对随波逐流的所谓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突显于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全球化问题，当前国外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1、激进的全球化主张。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著名观察家和评论家大前研一及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2、温和的全球化主张。戴维·赫尔德称之为变革论者，他认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贝克，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当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过程，要努力适应这个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但是非常不确定的世界；3、怀疑论者的批评。以赫斯特、汤普森为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神话，它掩盖了国际经济不断分裂为三个主要地区集团、国家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

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

也呈现出来，从达沃斯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到意大利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抗议和流血事件不断增加，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不断增大。事实证明，全球化强劲之时，也正是民族化高涨之日。正当国内学者高扬全球化之际，海外的华裔学者却强烈地呼唤民族化。东西方文化各有所长，西方进入后现代以来，其文化日益走向衰微与没落。东方文化中的“不偏不倚”的理性精神、“合内外，平物我”的思维方式、“技进乎道”的美学原则、“游于艺”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受到西方思想界、艺术界的关注。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同样不赞成“东方中心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国艺术的振兴，必须依赖中国文化的崛起，而不能寄托于任何外来文化。

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编撰方法常常局限于视觉图式与美术风格的自身流变，缺乏对艺术的地理文化基因及整体学术环境的深层挖掘，结果是只见图像，难现文化。为改变这种弊端，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阐释范式与观照视点。现、当代以来，对美术作品、美术家、美术思潮、美术现象、美术史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跨学科的方法，对美术的文化学阐发已成为大势所趋，所以我们主张采用一种全方位的多元化、立体式的学理方法对艺术予以重新洗牌。

《中国艺术地理丛书》力求打破单纯、狭隘的美术史研究思路，力图将视觉图像和地理文化有机融合，相对淡化艺术史比重，强化艺术文化学内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特点、文化传统、哲学背景与美学思想，它们必然渗透到该国家、该地区的美术创作之中，我们着重分析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从而实现对艺术的整体性解读，形成一种系统化的艺术研究格局。

艺术地理不仅仅是一个地域艺术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时空范畴和人格美学理念。所谓文化时空范畴是指每个地域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空间，这种文化时空首先带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它是本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显学，是该地区文化之本质所在；其次，它具有一种普遍的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形成

了很强的权威性；再次，它又具备一种文化的延续性与继承性，是世代文化不断积淀、传承的结晶；最后，它也有一种流动性和漂移感。每一个地域的文化艺术特征尽管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艺术的碰撞、对接中不断转化、异变。

本套丛书主要以视觉艺术为切入点，阐释不同画家不同绘画作品的地域特色。首批书目包括《燕赵艺术地理》、《巴蜀艺术地理》、《楚艺术地理》、《齐鲁艺术地理》《内蒙古艺术地理》及《台湾艺术地理》。《中国艺术地理》丛书属于文献性批评专著，与美术批评史较为类似。对于古、近代艺术地理及艺术家，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和线索，不作详细的考证，而对于现、当代艺术地理和艺术家，我们则作为重点加以详尽的评论，因为批评家的职责重在发现、推介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史的记录员，批评家的目的是捕捉前卫思潮，进而构建艺术流派，他们永远站在时代的前沿，充当艺术界的先锋与前卫。

该丛书的作者大部分是青年学者，他们思维活跃，少有城府与定见，更多的是朝气和锐意，相信他们能够不负众望，着力求新，写出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力作。

主编黄丹麾

2004年4月18日

于北京思陶居



绪论 富有神奇色彩的楚国

楚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神奇色彩的国家。战国时期，唯有楚国能与秦国相抗衡，并有与秦二分天下之势。威王后期，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所辖之地几乎包括了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其文化也渗透至当时各个诸侯国，其中也包括秦国。近代考古发现的墓葬文物均可证明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些学者设想，假如当年楚国未被秦国打败，而是相反的情况，那我们中国的文化现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为了了解有着传奇色彩的楚国，我们先来看看楚国的历史文化。

从文献可知，楚国最初的族源具有神话色彩。文献所载，楚国为祝融之后，祝融是一个笼罩在神话光环下的形象。远古的情况我们无法得知，但据有关文献记载，祝融为楚民族之始祖。《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尝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1988年发掘的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就记载了楚的先祖老童、祝融，与文献记载相合，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均载，炎帝是南方和夏季的帝，祝融是南方和夏季的神。所谓“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高诱注曰：“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死托祀于南方，为火德之帝。祝融，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20世纪40年代，

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一件楚帛书中提到了许多楚文化系统的传说人物，其中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意思是说炎帝命祝融遣四神降于人间，安定日月星辰，建立四极以承天覆，三天，指日、月、星。从这件出土的楚帛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到，炎帝是祝融的直接上司，因此，炎帝属楚人之帝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祝融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地位崇高的职务。在前面所摘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中提到“居火正，甚有工，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后又以其弟吴回“复居火正，为祝融”。由此可见，楚先祖重黎、吴回兄弟二人都当过以“火正”为职责的祝融之值。而“居火正”也只是学术界认为祝融所任职责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祝融是古代的天文官，掌管观星。其理由是，他的火正职责，据《汉书·五行志》所记载，为“掌祭火星行火正”。意思就是通过观测火星来确定春耕的时节；“行火正”就是掌管放火烧荒，以备耕种。但无论祝融的确切职责是什么，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职位，所以直到今天，民间仍奉祝融为神。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记载，“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在楚国的历史上占据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鬻熊是商末周初中国的重要人物，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由此可见，鬻熊被放在商末显官辛甲大夫和周初重臣散宜生

之间，其地位也非同一般。《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也有相关记载证明鬻熊的重要地位。例如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鬻熊带领楚人绝处逢生。在鬻熊之前，商王武丁曾出任重兵征伐荆楚，使楚人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于是鬻熊率众弃商从周，使得楚人终于得以生存且向前发展。

鬻熊之后，其子孙以熊为姓，历史所记载可查的有其后的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黑旦、熊胜……直至楚终。所以楚国君常自称“熊某”。

楚人从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开始至约前704年称王立国，再至前223年被秦国所灭，其历史逾千年。公元前223年虽被秦国所灭，但到前205~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其间推翻秦朝暴政的主力是楚人，进行统一战争的双方领导人及其核心骨干集团的成员，也均是楚人。汉朝皇室及初期的将相大臣、元勋故旧，绝大多数也都是楚人。由此见得，楚国虽灭，但楚人仍以其强大的势力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之上。

第一章 秀水福泽的楚国疆域

在夏、商交替之际 黄帝、颛顼之后半姓季连部南下与居住在丹水、荆山、沮漳河与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长期融合 在商末周初形成一个新兴的民族群体——楚。这个区域范围是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楚最早的地理位置。至西周初



年，楚人，主要是季连的半姓后人，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又至鬻熊为首领时，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周成王时，因感知楚人对周公有庇护之功，便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至此，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也正式诞生了。

楚国正式诞生后的第一个世纪举步艰难，直至熊渠时期，才逐步繁荣，日渐强大。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有谋有略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加强军事管理，趁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此后楚国疆域就日渐扩大，直到几乎囊括半个中国版图。

战国初期，楚国已成为各国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其疆域包括今四川东部、湖北全部、湖南东北部、河南南部以及江西、安徽、江苏 3 省的北部。

楚立国约 800 年，开拓疆土 5000 里，鼎盛时期的楚国，据《淮南子·兵略训》所记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郟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由此可见，楚国当时的疆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方。当今中南部的各大省会城市的建设无不有着楚国的功劳。楚文化也逐渐渗透到各个地方。详细的情况在后面的内容中将会有讲述。

楚地地域广阔，包括了中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其气候特点也非常多样，中部四季分明，南方四季如春夏。但总的看来，南方以亚热带为主，降雨丰富，对种植业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楚国在自身资源供给方面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中国战国时期是相当优越的，所以这中部地区也是兵家常争之地的原因。中原地区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加上楚地本身物资丰富，所以楚人自古并没有多少忧患意识，于是贯穿楚文化精神的多为浪漫主义，富于想象，就算哲学也具有超脱性，从

世俗的纷杂中提炼最最本质的东西。

第二章 灿烂丰富的楚国文化

谈到荆楚文化。其历史的源头可上溯到 200 万年前活动在三峡地带的巫山猿人。到新石器时代 荆楚文化的分布区域逐渐扩大，西至三峡 东达鄂东 北至豫西南 南到湘北，并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差异的若干亚区文化。同时，文化的中心也逐渐从西部山区向江汉平原中部转移，其稻作农业文明则逐渐由南向北传播，初步形成了荆楚文化的分布格局。这后来形成的文化布局才是真正具有楚地特色的楚文化。



在中华民族整个文化体系中，各个区域文化群芳斗艳。无论是历代所沉积的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社会所建构的新的文化体系，都充满了地域特色。其中有代表性的楚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自古到今都有其发展的脉络与历史继承。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有关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大概有 2000 多年。这里，我们提到了一个“荆楚文化”的概念，其实“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族、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在历史上，荆、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 3000 多年了。《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

《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根据《春秋》所记载，鲁庄公前 693—前 661 之前称荆，自鲁僖公前 659—前 627 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由此看来，无论是荆、楚、荆楚，还是楚荆联称，其意思都是一致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时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我们翻阅对字的解释，亦可以看到：“楚”是一种植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荆棘”的“荆”这种植物。从这最原始的解释中可以得知，我们楚先人就是在这一片荆棘蛮地开始起家，并不断强大，直至统治半个中国。

一、楚国的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对于楚文化，我们通常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四个方面来理解探讨。就农业方面来看，楚国由于地处南方，气候、土壤有利于动植物的生长，有些地方甚至一年四季都有农作物产出。在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农业还是人民生活、生产的基础。由农业所影响的包括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这几个方面。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由于农业的需要，而产生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先进铁农具与发达水利事业，这也是楚国农业的两大特色。战国时期，虽然战争从未停止过，但楚国也从未因为后备物资的原因而战败，相反，尽管战争连连，但农业依然有稳定的发展。《战国策·楚策一》中所记载，“楚，天下之强国也。……

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从古至今，楚国的中心地带都没有过偏离长江这个充满博爱的水域。水，作为南方最大的自然资源，养育了亿万人口，同时她也是城市诞生的摇篮，几乎所有的城市最初的建立



就是临近水域的。被司马迁誉为第一循吏的春秋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孙叔敖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工程，防治水患。孙叔敖在成年后随父亲迁居期思（今河南固始境内）。他发动当地民工排除农田渍水，在雩娄（固始东南）开挖渠道，修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取得了显著成效。楚庄王知道后，拜他为楚国的令尹（宰相）。之后，他又组织农民在芍陂（今安徽寿县境内）修建了蓄水灌溉工程，灌溉附近大片农田。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大大促进了楚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了充足的粮食，使楚国国民富足，国力增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楚国霸业的建立与它强盛的农

业有着紧密的联系。

楚国手工业的成就也十分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最为突出，可谓达到当时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惊叹。手工业的发达也使得楚国艺术的发展得到物质依托，如果没有较高成就的手工业，那楚艺术的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有关依附手工业的楚艺术，我们在后面将详细讲述。

楚国历来重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其社会经济已经成为商品经济，虽然它同其他国家相比显得有些早熟。公元前 597 年（鲁宣公十二年）晋师伐楚，随武子认为楚国“商农工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楚国商业发育较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殷商时代，楚人便与殷商有

密切的商业往来，由于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而楚独用铜贝（称蚁鼻钱）作为货币，由此事实可以推测：楚原先确是殷人的贸易伙伴，楚国也是我国早期商品经济和货币的策源地之一。货币的产生正是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周武王克商，与荆楚保持贸易关系，并封以子男的爵号。不仅如此，楚人还跟西南的越人、巴蜀人、滇人做生意，并通过他们与印度和南洋发生贸易关系，用缁帛的工艺品换取那里的货贝，大量运入殷周。也就是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经开始进行海外贸易活动了。在楚国时代，楚国更是具有明显的重商倾向，主要表现在：第一，



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第二，商人居四民之首，中原的“四民”按“士农工商”排列，而楚国却有“商农工贾”之称，“行曰商，坐曰贾”，商贾并列，而这只能归因于楚人对商业的重视及商贾在楚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第三，国家、官府垄断工商业。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 50 乘车、水路可带 150 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从鄂地出发，出汉水，经长沙，入来水，南向鄱（今永兴），抵洮阳（今广西全州），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到达南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这种商业贸易在当时规模是相当大的。同时他又拥有许多贸易特权，这样就更加刺激了其商贸的扩大经营。其商队在当时影响颇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种商业贸易在当时还是非常可贵的。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楚物质文化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先进的程度，早已脱离了“荆蛮”之称。

二、浪漫的楚国精神文化

楚人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包括语言、文字、典籍、民本思想、朴素唯物观、宗教思想与宗教活动、科学技术、文字艺术，以及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理财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想精粹。其中有的大家名著如《老子》、《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早已登上世界文化最高成就的殿堂，成为人类的骄傲。在《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且是孺幼皆知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最有名的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亦神亦人形象，反映了楚



爱莲图
冯今松画
一九八二年
今松画於此日

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精神。在楚人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祇还是人鬼，都是活灵活现、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这些精神人物形象的积淀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虽然楚国诗歌数量不算多，其成书多见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明显的

“楚风”特征，但《周南》、《召南》等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一些作品散见于其他典籍，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这在中华文学史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今都依然被称为典范。

庄子，是一位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丰富多彩，他的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寓言本身就是寓理于言，庄子用简明的语言传播于众，使人明理。《庄子》是一部影响力颇大的哲学著作，但同时它也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流畅且变化多端，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融于其间，具有楚人特有的浪漫情怀，《庄子》一书对其后的文学影响也是很大的。庄子的美学也带有很大的独特性。庄子很少单独讨论美的问题，也没有像儒家美学那样专门而详细地去讨论诗和乐的问题。庄子的美学同他的哲学浑然一体。他的美学即是他的哲学，他的哲学也即是他的美学。这也是庄子美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庄子》书中多次谈到了“天地之美”：“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天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最富盛名当数大诗人屈原。他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说到楚辞，不能不谈《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